

第十五版

世界史纲

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英]赫·乔·韦尔斯著
吴文藻 谢冰心 费孝通等译



(上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十五版
(上卷)

K109

4/

2

世界史纲

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英] 赫·乔·韦尔斯 著

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邝平章 译
李文瑾、陈观胜、李培莱、徐先伟

雷蒙德·波斯特盖特 增订
乔·菲·韦尔斯

弗·霍拉宾 绘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1

根据美国纽约多布尔迪公司 1971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英)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
费孝通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

(世界名著译丛)

书名原文:The Outline of History

ISBN 7-5633-3321-5

I . 世… II . ①韦… ②吴… ③谢… ④费… III . 世界史 - 普及读物
IV .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77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787mm×1 092mm 1/18

印张:54.5 字数:85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 501~15 500 定价:99.00 元(上下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奇人与奇书(代序)

——韦尔斯及其《世界史纲》

时常为我们这些受过历史学专门训练的人感到惭愧。就对大众的影响力而言,有几位史学家的著作能够与房龙、茨威格、韦尔斯等人的著作相比。这些人很难被认定为严肃历史学家。不过他们的著作无疑比一般史书有着高得多的可读性,有着大得多的吸引力,有着另一种迷人魅力和风味,字里行间透出难以抗拒的激情(这一点尤为史学家所诟病)。一部《宽容》,一部《昨日的世界》,一部《世界史纲》,倾倒了来自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多少人!这几个人都非常多产。相比之下,韦尔斯更为惊人(看看卷末所附他作品的目录,即可有些初步了解)。他的著作之多,兴趣之广泛,也许是最近几代人中无人可以匹敌的。而他在英语世界中的影响,大概除同时代人萧伯纳之外,也是无与伦比的。不知道到底该把他归到哪一类人之列,小说家、记者、政论家、预言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可以说他一人具有所有这些身份。笔者宁愿称之为奇人。

说韦尔斯是奇人,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他在不足 80 年的人生中创作了一二百部作品,在年近七旬之后仍以平均每年不下两部的速度进行创作。这些作品中,不下十部仍在不断被重印,近十次被拍成电影上演。它们涉及科学、文学、社会、政治、战争等各个领域。一个取得了如此惊人成就的人,竟然主要靠自学,靠其广泛阅读的习惯而成才,这难道还不神奇吗?

韦尔斯全名赫伯特·乔治·韦尔斯,1866 年 9 月 21 日出生于英国肯特郡布伦莱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家小商店老板,母亲一直在附近的厄帕克庄园任管家。7 岁那年,他进入布伦莱的莫利学校读书。不过,韦尔斯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甚至在还是一

个婴孩时,特别吵闹的他就对事物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总是强烈地自己的情绪要求。这种性格致使他接受的教育不系统、不连续。14岁时他就离开了该校,开始步入社会,到温莎和绍斯西的布店当学徒,一干就是四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并不美好,后来他曾在《客栈》一书中记录过这种让人深恶痛绝的生活。1883年,他再次反叛,到一所私立学校任教。一年之后,由于偶然的机会有了奖学金,到南肯辛顿科技师范学校(后来的皇家学院)学习生物学,成为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学生。韦尔斯对生物学的兴趣,以及他对进化论的迷恋,都来自赫胥黎的影响。在大学期间,韦尔斯创办并主编过《科学学校杂志》。但到了第二年他就对这所大学的教育感到厌倦。1887年,未拿到学位,他便离开了学校,又到一所私立学校教了四年生物,直到1890年拿到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891年,韦尔斯开始在伦敦发展,在一所函授学院教书。他与表妹伊莎贝尔结了婚,但这一婚姻为时非常短暂,不久两人分了手,韦尔斯与他的一位学生埃米·凯瑟琳·罗宾斯重结连理。此后,他放弃了教师职位,开始在小说创作方面发展。

韦尔斯的创作生涯始于1891年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珍品的重现》一文。1893年,其第一部著作《生物学读本》出版。1895年,《时间机器》使他一举成名。此后几部更为成功的著作,《莫罗博士之岛》、《隐形人》、《世界上的战争》、《当睡着的人醒来时》、《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和《空中战争》等,确立了他作为科学小说作家的声誉。这些作品还使他在美国成为名人。读者面很广的《时尚杂志》(*Cosmopolitan*)连载了《世界上的战争》和《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科利尔杂志》(*Collier's Magazine*)、《新共和》(*New Republic*)和《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等也刊载了他的作品。一时间韦尔斯稿约不断,几十家报刊、出版社抢着他的文稿。

韦尔斯的文学创作可以划分几个方面。上面提到的几部书反映了他早期创作的成果。这些作品都是一些与科学相关的作品,可称作科幻小说。它们是韦尔斯众多作品中最为现代读者所熟悉的,其中充满了想像和迷人的推测、猜想,具体体现了他那一时代人们的政治和社会信念。书中预言了科学创造提供的机会,预见到了坦克、原子弹等现代武器的发明,并发出了关于其危险性的警告。但韦尔斯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自1900年开始,他以正规小说形式写作,由想像转向社会现实,创作了第一部非科学类小说——《爱与刘

易斯先生》，写他在南肯辛顿的学生生活，关注男女之间的关系，并把性当作这一关系中机器的组成部分。评论家认为这部书及韦尔斯的其他作品给英国小说带来了活力，韦尔斯也因此被认可为作家。他还创作了其他成功的半自传体小说，如《客栈》、《托诺—邦盖》、《波利先生的故事》、《恩典》等。这些小说讽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秩序和支持它的正统派意识，被认为代表着韦尔斯文学作品的最高成就。

作为一个对社会负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韦尔斯创作了大量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作品，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思想。他渴望直言不讳地批判过去，希望像先知那样写出一些作品来。《预测》、《未来的发现》、《创造中的人类》、《机械和科学发展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可能产生的作用》、《现代乌托邦》、《生命科学》、《世界史纲》和《未来事件的形成》等，这些作品使韦尔斯获得了对预言家的称号。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他撰写了大量政论性作品，如《布特林先生看穿了它》、《工作、财富和幸福》、《公开的密谋：世界革命的蓝图》等。他对频繁的战争忧虑重重，认为这会毁了世界文明。他曾渴望用战争制止战争，但战后的各种和约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他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世界——这是那一时代许多人的理想，但结果并不令人乐观。韦尔斯很早就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曾参加英国激进的政治派别费边社，试图把它扩大，致力于宣传和群众运动，但因萧伯纳和西德尼·韦布夫妇等资深成员的反对而落败。他曾数度访问苏联，与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进行过交谈，但苏联的发展令他失望。韦尔斯相信未来将是“教育与灾祸之间的竞赛”，解决世界灾祸的办法是进行世界性的教育。按照他的梦想，国际联盟能够消除世界秩序不稳定的危险，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其晚年世界危机的日益加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他几近绝望。结果他愈来愈陷入悲观主义的情绪之中，《威廉·克里索尔德的世界》、《即将来临事物的形态》、《世界大脑》、《走投无路的心灵》以及他最后一部有持久价值的著作《自传实验》，都表达了他对人类未来前景的悲观态度。

不过，虽然他对未来不无悲观，但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而非消极等待。在此，我们不妨引用韦尔斯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几段话来看看他的信念：“如果我有点像社会平等论者的话，这……是因为我要使机会普遍，不让一个有价值的人失掉机会。如果我要求经济上的变革的话，那是因为目前的制度保护而且培植着一大群挥霍

的浪子……如果我反对民族主义和战争的话,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东西意味着精力的巨大浪费,而且还因为它们维系着一大堆盲目的纪律和忠诚的教条,以及各种各样的旗帜、制服和阅兵式;我反对民族主义和战争,还因为它们把我们的生命置于一些受过训练的傻瓜的摆布之下。如果说军国主义和战争不比幼稚可笑的东西更可怕的话,它们至少也是一种十分幼稚可笑的东西。……我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公开的图谋,其目的是加快这些讨厌的、浪费的、邪恶的东西——民族主义和战争——的消灭,结束这个和那个帝国,并建立起一个全人类的帝国来。”他笃信科学的价值,“正是在科学领域里,我找到了那种对伟大目标的大公无私的忠诚,我希望这种忠诚最后能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整个领域中去。也正是在科学领域中,我发现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相互合作,来增长人类的知识。我们都可以成为科学的自由国度里的公民”。固然,“世界在过去几年里显然变得更黑暗、更危险了。在广大的地区里,公开的言论自由消失了;混战厮杀、大量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生活的分崩瓦解愈来愈严重。暴力已经向世界和平进逼;人类文明生活的水平显著地在下降。我们许多人对苏俄的生活方式所怀有的希望已逐渐消失,几乎化为乌有了”,正因为如此,“采取积极行动来阻止这种衰败现象的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了”。我们“必须构想出一个可以接受新世界的远景。要工作,要努力工作,产生出一个经过探究、试验和考验的共同计划,把人类的思想统一在一个世界的新秩序里!……任何更美好的生活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教育革命,一种新的百科全书主义,一种新的精神方面的统一平衡;不能做到这一点,人类就必定灭亡”。1946年8月13日,韦尔斯与世长辞,当时他正主持一个研究如何应对核战争的种种危险的项目。

仍记得第一次阅读《世界史纲》的情景。那是1983年年初,该书的中译本刚刚出版的时候。仍记得一些当时阅览此书的一些感受。当时国内史学界关注的是土地关系、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经济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等,在历史教学和历史课书中随处可见的是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述。不记得课堂上有人讲过文明问题,似乎更没有人关注过人类的命运等问题。“文化”一词倒时常被提及,但它被理解为狭窄的文学艺术建筑等,在每一节的最后孤立地论述,完全是一种点缀。本应丰富多彩的历史变得枯燥乏味。《世界史纲》让人

为之一振:历史竟还可以这么去写,历史竟还具有如此的魅力!再次翻检此书,仍有这么一种感受。

撰写历史并不容易,撰写通史更加困难,而以一人之力完成这么一部巨作,更是让人难以想像的事。因为“接受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纲的这项任务,对任何已经成名的历史学权威来说,会意味着危及学术声望的灾难”。一个未曾接受过历史学专门训练的外行人却完成了这一宏业,完成了一部影响了许多人的巨作,这不能不让人再次啧啧称奇。

《世界史纲》出版于1920年,它的意图就在于“以平直的方式,向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展示,如果文明要想延续下去,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发展成为世界性联盟是何以不可避免的”。而其一个主题就是要说明,世界只有通过教育而不是战争和革命才能得到拯救。概括起来,我们认为《世界史纲》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该书达到了一部世界简史所能达到的高度。它从地球的形成开始谈起,一直叙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简明的笔触叙述了世界上各主要文明、文化的进化、发展过程,描写了人类取得的胜利和遭到的失败,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主要危险。这么一册书在手,能对整个世界历史有较为全面的了解。韦尔斯就像一个导游者,领你沿着文明之路(包括如何进化到文明)从远古最早的开端走到现代,让你看到一切人文制度的生长和变化。诚如作者所言,他是一个导游者,领你拜见亚历山大大帝、波斯诸王、罗马皇帝、十字军战士、中国皇帝、基督教教皇、法国公民、俄国沙皇等,当然,也领你去细细体会人类文明永恒的东西。然后,他会在你身边站住,轻轻地对你说:“这就是我们的遗产。”

其次,这是一部“私人的史纲”。虽然作者不是一个历史学者,但他有一个癖好,即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神往不止。旷野是他的家,他可以自由自地在史学领域里遨游,而不必顾忌种种清规戒律。因而,本书在章节的安排和着力的大小上,甚至在对事件的评价上,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在本书中,可以读到在其他煌煌史学巨著中也语焉不详的东西,比如,书中可以用相当的篇幅叙述大西洋岛的传说,可以用30余页去讲述亚历山大大帝,可以用十几页去讲亚历山大城的科学与宗教,可以专节叙述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受作者个人思想的影响,作者对各种进步运动,如宗教改革、达尔文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实验、社

会主义运动(带有作者所处时代的特征),不惜笔墨。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老书,即便到了今天,闲暇时翻翻它,仍会发现不少让你觉得新鲜的东西。

这无疑是一部通俗的史书,但它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在笔者看来,也具有非凡的价值。它没有严肃史著的学究气,而且比那一时代的许多著作都要早地摆脱了民族主义乃至(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中心论的褊狭。书中关注的是人类文化的遗产,包括思想、文化、宗教等遗产,而这是人类文明历程中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本书独具的还有对科学的关心。我们不妨撷取几句:“在野蛮人和原始人看来,大地似乎是整个宇宙的一片平坦的底板……望远镜的发展的确标志着人们思想的一个新的阶段,人生观的一个新的境界……它解放了人们的想像力。”“自从最初的文字出现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开始有了一种新的传统,一种能永存不朽的传统。”作者称颂了中国人的智慧,但也对中国智慧的局限性感到困惑:“中国在6世纪就知道火药……但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组织起一个对世界近代科学起先导作用的记载和合作探讨的体系呢?虽然他们的一般训练是有礼貌而克己的,为什么思想教育从来没有渗透到一般民众之中呢?虽然他们天赋才智特别高,为什么中国广大群众从来一直是,而且至今仍是文盲居多呢?”也许你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但无疑你会同意,本书注意到了人类发展史上一些有重大意义的东西。

从上文可以看出,作者字里行间倾注着激情。佐以作者非同寻常的文笔,你会感到读这么一部书是一种享受。厚厚的三十八章,计约85万字,涉及的不乏枯燥的历史事件,但深入进去这部书,你决不会有这种不好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读。作为一位受到萧伯纳推崇的作家,韦尔斯在书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这种才能。比如,在描写佛陀得道的经过时,作者这样写道:“乔答摩独自游荡了一个时期,历史上最孤寂的人,正在为光明而战斗。当一个人的心灵抓住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时,它向前迈进,一步一步地巩固阵地,并不了解已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直到突然间,就像黑暗中忽然大放光明一样,它实现了它的胜利。看来,乔答摩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他坐在河边一棵大树下,就食时,达到了这种彻悟的境界。他似乎觉得自己已明白了人生的奥秘。据说他坐着深思了一天一夜,然后起身把他见到的传诸世人。”然而,人世间还有灾难,还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零三个月,它几乎逐渐地至少把

西方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拖进了旋涡……战争已变成一种气氛,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后,它又突然结束了……人们想笑,也想哭——真是哭笑不得。兴奋的青年们和度假的年轻士兵们组成稀疏而嘈杂的游行队伍,挤过人群,尽力做出欢乐的样子……鞭炮和花炮到处乱扔。但是人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欢乐。每一个人几乎都因为损失太重,忍痛太深,没有什么热情去庆祝了”。你不得不叹服,丰富多彩的历史就应该用这样的文笔来写。

自然,书写得好,还需要译得好。翻翻版权页,你就会发现,在现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情况下,再找到如此强大的翻译队伍几近梦想: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他们哪一位不是中外兼修的大家!这个译本依据的是在韦尔斯原著基础上由后人修订过的版本。此前,早在1927年,我国就出版过另一大家梁思成等翻译、梁启超校订的韦尔斯原著初版本。但如果有暇,到图书馆找来那一已经发黄的译本与现译本对照着看一看,相信会有不少收获。笔者甚至觉得,拿来梁译重印,同样会产生引人注意的效果。

肖 昶

2001年8月20日

导 言^①

《世界史纲》编著的经过和宗旨

1 本书是怎样编写成的

这部《世界史纲》最初是在 1918 到 1919 年编写的。分册出版时各附有插图,1920 年详加修订,合并成全书重印。1923 年(1 月)为了再版又一次严格修订和重新编排,1925 年重新发行一个修订的和附有更丰富的插图的版本。1930 年发行的是全新版本,多处经过重新编排和重新编写,并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这个版本 1939 年又进一步经过修订。

推动一个作家在 1918 年去尝试编写一部世界史是有许多原因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末、最腻人、最令人感到幻灭的一年。到处是罕见的匮乏,到处是悲痛的哀悼。死亡和伤残的总人数高达好几百万。人们觉得面临着世界事务的危机。他们过于疲乏和悲痛,无意去考虑错综复杂的前途。他们弄不清楚他们究竟是碰上了一次危及文明的灾难,还是面对着一人类集团生活新阶段的开始;他们用了如此直截了当的非此即彼的简单眼光来看待事物,他们一直抱着希望。关于可能发生的国际政治的新安排,关于废除战争的国际

^① 现在这个中译本,是根据原著 1971 年增订版重新译出的。这一版除修订了一部分韦尔斯著作中已过时的材料外,还增加了主要是第一次大战后到 1949 年的部分,即第八编的第三十九章一部分和第四十章。但为了尽量保持韦尔斯原著面貌,这个中译本把增加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全部略去了。

本书译者除已署名者外,还有李佩娟也参加了部分翻译工作。地图的翻译工作由闻宥、陈佳荣担任。地图和若干表解的绘制工作由王传纪、杨节铿、何春风、皇崇尼和党力文担任。

地图和插图均据原书,书中方括号内的文字系译者所加。

条约,关于国家之间的联盟、民族之间的联盟,议论纷纭。每个人都是“从国际的角度来思考”,或者至少试着这样做。但是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到处觉得对于这样突然地和悲剧性地落到世界上这些民主国家头上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要害所在是了解得不够的。“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们问,试图从有关萨拉热窝的争端和比利时的“一纸条约”的背后去查究引起这些事情的更广泛、更深远的原因。这次跨越莱茵河的悲剧性的仇杀的开端是些什么呢?为什么它竟会影响整个世界呢?为什么日本在半个世纪之前还是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还是个浅薄手笔下的传奇世界,还是个几乎和另一个行星一样遥远的诙谐喜剧的乡土,而现在却正以巨型战列舰在地中海上巡逻呢?为什么沙皇帝国会像梦一般的消逝了呢?土耳其老实说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什么是一个帝国?帝国是怎样开始的?是什么使德意志从多种多样的小邦转变成一种侵略性的意志和权力的象征,并使人类的一半对德意志的威力产生恐惧呢?

人们,男的和女的,试图回忆他们在短短的学生时期从学校里学得褊狭的历史,他们发现那无非是一张枯燥无味和部分已忘掉了的各国帝王或总统的名单。他们试图查阅这些事件,面前是浩如烟海的书籍。他们发现,他们是被人蒙上了民族主义的眼罩来学历史的,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一切国家都视而不见,现在他们突然发觉周围光辉夺目。这使他们在确定所讨论的各事件的相对价值时特别困难。许许多多的人,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当然——他们并不是已经受过专门训练的——多多少少有意识地在寻找整个世界事务的“诀窍”。事实上他们为了他们自己所用,都在头脑里即兴地编写着世界史纲。

作者在任何专业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自从他一生事业的开始起,一直在编写他自己私人的史纲。他经常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神往不止。这是他的癖好。即使在他还是一个爱好自然科学的学生时,他常保有一本阅读历史的笔记。他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时间机器》(1894),是关于人类命运去向的异想天开的一种推测;《当睡着的人醒来时》是对我们文明发展的生动形象的夸张;《预测》(1900)是想论证当代潮流某些可能的后果。在他所写的许多书里,例如《辉煌的研究》和《不灭的火焰》中都缀上了小世界史纲的花饰。因而当他碰到战时思想动乱的时候,他即使不是特别有了准备,至少也是特别倾向于对过去的和现在的事物采取一种通观全

局的看法。在他开始编写这部《史纲》以前的一些时候,他曾从事于研究战争善后问题和创立一个国际联盟的计划;那是在已故的威尔逊总统接受那个建议以前的那些日子里。做这样的工作就必然要参与各式各样的宣传团体和会社的争论及组织活动。在这些集会上的讨论十分生动地显示出在一切政治活动里一个人对过去的看法是极其重要的。的确,一个人的政治活动岂不就是他对过去的看法在行动上的表现吗?所有那些对国际联盟的各种计划感兴趣的人,他们的思想是乱七八糟的,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人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曾经是什么,因而将会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一些极为模糊的、异样的和杂乱的臆度。很多情况是异常精确的专门知识却和对一般性历史的最粗浅和最幼稚的臆度相结合在一起。

对作者来说,似乎越来越应当把地图和笔记收集在一起,比过去更有系统地进行阅读,把那些对他还是极为模糊的历史问题搞个清楚。当他着手这样做时,就清楚地看到,要是把他私藏的关于历史概要的备忘录,变成一种提供给比他自己更忙碌和经常被别的事务分心的人们使用的普通读本和手册,这会比越来越没有希望地纠缠在未必会产生的世界联盟的那个不可能出现的宪法的争吵上有益得多。他越是打算对人类在时空中所处地位的现有知识写个评论,越觉得承担这项任务困难、引人和欲罢不能。

一开始,他打算总的回顾一下欧洲的统一体;对罗马体系的兴亡,对帝国这个观念在欧洲顽固地存留下来,对不同时期所提出的统一基督教世界的种种计划,列出一份提要。但是很快就明白,没有任何真正的罗马或者在犹太从头开始的事物,也没有可能把这个故事局限于西方世界。这些都不过是一出巨大得多的戏剧里较后一幕而已。他发现,这个故事一方面把他带回到了在欧洲和西亚的森林和平原上的雅利安人的起源时期,另一方面又把他带回到了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一度曾有人类生息而现已淹没了的地中海盆地的那些早期文明。他开始认识到欧洲历史学者怎样严重地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他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遥远的古代怎样依然生气勃勃地活在我们的生活和制度里;看到如果对人类集体生活的早期阶段没有一些了解,我们对今天的不论是广泛的政治、宗教或社会问题的理解就会怎样地浅薄。这里也包含着对人类起源的一些了解。

当他思索推敲怎样编写这部《史纲》时,这部《史纲》本身就已伸

展和扩大了。有一个时候,他面对这不断在扩展着的工作的史诗般的无边天地犹豫了起来。他追问自己,这项工作由一个历史学者来做,比起由一个迄今不是写推论性的论文就是写小说的作家来做,是否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似乎又找不到哪一个历史学者能够这样肤浅——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广博和这样浅显,以致可以概括这个计划的浩大的领域。

现今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惟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史互不连贯;他们害怕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甚于害怕作出可以争论的错误评价。这样做是正确和应该的,在一个匆忙和轻率的时代里,所有专心从事工作的人们应当遵循一个要求精密准确的严格标准。但是这种要求细节上准确的高标准,使我们无法从历史学家那里找到我们这里所需要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任务,而是一件苦恼的工作。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的只是积累起来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他们现在确实已给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益于学者们的卷帙浩瀚、手笔众多、观点繁杂、神旨意趣各个殊异的杰出的和可贵的编著。但这些宏伟的功绩,对于在人生旅途中过往的普通公民来说,为了日常的目的,在感染力和应用的便利上都和卷册可以满架的百科全书并无二致。

在美国诚然可以找到若干有用的本世界通史,著名的如鲁宾逊和布雷斯特德合著的古代和近代史,以及赫顿·韦伯斯特的和W.M. 韦斯特的类似著作;但是这些作者的对象是中等和高等院校,而不是普通读者。F.S. 马文的《活着的过去》又是一本值得钦佩的关于思想的进步的论文,但是没有提出多少扎实的事实。接受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纲的这项任务,对任何已经成名的历史学权威来说,确会意味着危及学术名望的灾难;即使作出了这个许诺,普通读者要读到这部书,也还是要等待很多年。然而,本书作者的地位却有所不同。他在性格上和意愿上与学术界的尊严相隔有如他与公爵的爵位一样遥远。这使得他能引起公众对历史的兴趣,而不致像一个公认的权威那样会招来任何尊严和荣誉上的损失以及恶意批评的危险。不受触犯是他的一项可喜的特权;他是一个文学上的贝都因人,旷野是他的家,除了自己的姓名,不知道有更值得骄傲的称号,惟一可以想像到的荣誉是他自己的人格。冒失地忽略了这个或那个专家所垄断的这个或那个珍贵的项目,也许会引起他们的震怒;但这也没有多大关系。他能毫无愧色地去利用标准读物和普通可以查阅到的资

料；他甚至无须佯作新颖的发现或独创的见解；他所要做的较为简单的事是收集、安排、衡量人类的伟大惊险经历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然后动笔写下来。他没有给历史增添什么内容，至少他希望没有增添什么到历史里去。他只不过为大量的资料作一个摘要，其中有些是很新的资料，他是以一个通俗作家的身份考虑到其他像他自己一样的普通公民的需要而这样做的。

然而，这个题目是这样的辉煌灿烂，以致任何一种写法，不管多么不出色，都不可能使它完全失去它固有的所向披靡的瑰玮和庄严。这部《史纲》如果有时写得吃力和可怜地不足，却也有时似乎有它本身的计划和它自成的体系。它的背景是深不可测的奥秘，群星的谜团，无可量度的空间和时间。出现了生命，它为获得意识而奋斗，结集着力量，积聚着意志，经历了亿万年代，通过无数兆亿的个别生命，直到它抵达今天这个世界的可悲的纷扰和混乱，这个世界是如此地充满着恐惧，然而又如此地充满着希望和机会。我们看到人类从孤独的开端上升到现今世界友谊的黎明，我们看到一切人文制度的生长和变化，它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变化得更加急速。这场表演在一个极大的问号上结束。作者只是一个导游者，他把他的读者最后带到当今的边缘，各种事物正在前进的边缘，然后在读者身旁站住，轻轻地向他耳语说：“这就是我们的遗产。”

这本《史纲》不过是对过去百年内地质学者、古生物学者、胚胎学者和任何一类博物学者、心理学者、民族学者、考古学者、语言学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大量活动所揭示的现实的初始图景加以通俗的叙述。如果认为它在任何意义上超过了这一点，那将是荒唐的。历史学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是些书本上的东西。钻书本的历史学者现在相当勉强地和冷淡地承认，他的地位只是对广阔的整体提供可疑的文件罢了。

我们的《史纲》描绘了这幅巨大的图景。这是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描绘的今天所见到的这幅图景的情形。但他是在他本人的局限性和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下写作的。这本《史纲》是一部适合于现今用的书——它并不奢望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它不过是一种通俗的叙述。这部 1931 年的《世界史纲》有朝一日将跟着它以前的几版一起进入旧书箱和垃圾炉。更有才能的手笔，具备更充分的资料 and 更丰富的工具，不久就会用更美妙的词句写出崭新的史纲。本书作者会觉得比起他自己所写的这部《世界史纲》来，更喜欢读的那部将是 2031 年的史纲；不但阅读，甚至会带着更大的好奇心去仔细地翻阅它的插图。

所有我们这些人,如果通过某种奇迹,能得到一部 2031 年写的世界史纲,我猜想,一定会一开始就翻看最后几章里令人吃惊的插图,然后去阅读和这些插图相配的正文。多么惊人的大事呀!多么难以相信的成就呀!但是,随后,至少本书作者会翻回到前面那些章节去看一下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有多少依然幸存。

大概前面那部分的总的轮廓大体上还是相同的,但是会有千百条现在还不知道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以及现在还想像不到的许许多多关于人头骨、工具、被埋没的城市、消失了的和湮灭了的民族残迹的引人入胜的新发现。中国的和印度的故事将会更加确凿,也许在质量上还有所不同。关于中亚,会知道得更多些;哥伦布以前的美洲或许也是如此。查理曼和恺撒仍然会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一些较近的巨人,例如拿破仑,可能已被缩小到不甚重要的地位。

2 本书编写的方法

1930 年修订本的主要目的是使这部《史纲》更为简单和易读些。

作者已经说过这部书是怎样地从笔记和地图发展起来的,他得承认当他现在翻阅早期的几版,分卷发行的初版和 1920 年成书的初版时,不能不感到笔记的意味实在太浓厚了。许多没有消化和不协调的资料都被放在附注里;踌躇不决、模棱两可、谨小慎微的词句实在太多;叙述有时也很混乱。他所采取的方法自然会导致这些结果。他请了四位主要助手来帮他工作,他们是雷伊·朗凯斯特爵士、吉尔伯特·默里教授、哈里·约翰斯顿爵士和欧内斯特·巴克先生。他请他们做阅读和资料来源的顾问。此外又在这一点或那一点,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上请求渊博的学者们的帮助和指教。例如丹尼森·罗斯爵士、克兰默·宾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在有关中亚和中国方面帮助极大。查尔斯·辛格博士在古典科学上提供了极有用的资料,约翰·L. 迈尔斯教授是地中海地区考古学珍贵资料的提供者,菲利普·古达尔拉是作者有关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欧洲政治的顾问,如此等等。J. F. 霍拉宾先生专长于政治及商业地理,不仅是本书插图绘制者,而且更是本书的合著者。还有其他许多人不惜为本书耗费时间和提供知识,全部名单已见于过去几版书中;对于他们,令人犹豫的是究竟应当表示感激他们,还是应当避免连累朋友。每章都是先由作者起草,打印好多份,分送给所有可能给予帮助的人,请他们随意在上面

挥写、评论或提出严厉的批评。作者于是在受过惩戒、指导之后，在毁伤和宰割过的原稿前坐下来，重新开始逐章编写。最后的校样又分发给主要的帮助者和其他任何对所述那一段历史时期有兴趣的人们。

这样的方法使得所引用的名称、日期等等的正确性得到了保证。但是作者虽在所有事实问题上绝对忠实地听从他所请教的这班老师们，而在表示意见的地方他为自己保留了作出个人判断的充分权利。结果是在密密麻麻的附注里，甚至在正文里，引入了各式各样活跃的争论。例如，对普通雅典人和伦敦佬在道德和智力的素质上进行比较时，作者同吉尔伯特·默里教授发生了争执，虽则作者承认这位教授对于雅典人的素质是完全熟悉的，而作者对伦敦佬的判断仍要保持他有自己看法的权利。关于格莱斯顿的教育是否健全的问题，作者同默里教授和巴克先生之间还有一页左右的争论。同欧内斯特·巴克先生还有种种持异之处。作者认为拿破仑一世的“伟大”是荒谬的和简直是不现实的迷信。他认为事实本身对此作了说明，在这本《史纲》的适当地方将以相应的篇幅举出这些事实。拿破仑是个具有墨索里尼那样品质的人，在智力上还不如拿破仑三世。但是巴克先生却不能接受这个鉴定。他写道：“请记住我的反对意见。”于是在附注里就这样记下了。哈里·约翰斯顿爵士的弱点——或不如说是他过分的优点——在于把众所周知的历史上的名称作出怪僻的、无疑是正确的拼写。他把 Solomon 写成 Shelomoh 和把 Hebrews 写成 Ibrim，这些对于普通读者似乎会是困难和混乱的。这个问题也反映在附注中。

这些附注对作者和他的朋友们有如家常谈谐一般，是用来逗笑的，本书扉页上四位主要帮助者的名字既和作者的名字一起列出，表示了他们的支持和在某种意义上的保证，这些附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对于大部分读者是会令人迷惑和腻烦的。附注、出处和条件的说明，对于一本写给学生们阅读的书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本《史纲》却是多余的，作者现在承认，甚至是有有点矫饰的。这一版里他们感激的心情免除了四位主要帮助者所担负的一切以后的责任。他们的名字从扉页上消失了。他甩下了他的领航员。他们曾替他把舵驶过了危险的浅滩，曲折的水道，达到他现在的自由和信心。受过这样的帮助，又这样地解放了出来，作者才有可能在他们的恳切关怀下，简单明了地叙述这个伟大的故事，并作出最充分的评价。